浅析奕䜣的洋务观

刘仁坤

第二次鸭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进行勾结过程中，由于政治条件的变化，加深了封建统治集团新的政治分化。洋务派产生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的历史背景下封建统治集团分化的产物。

洋务派的产生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保守与应变两种力量角逐的结果。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加速半殖民地化过程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向地主阶级冲击的历史产物。而皇族奕䜣就是这一派的首脑人物。

爱新觉罗·奕䜣(1833 一 1899)，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帝之异母弟。奕䜣从幼年起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曾先后受业于著名儒学大师翁心存、贾祯门下。咸丰帝即位后，封其为恭亲王。奕䜣攻读儒家经籍，通晓古今政事，在清朝皇族中是具有政治头脑的干练人员。

奕䜣，最初以抵御外侮，维护清朝封建统治而自命。他认为外国侵略者"夷性无厌"，"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后已。"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坚决主张抵抗英法联军的军事讹诈。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以前，奕䜣反对同外国侵略者妥协，向咸丰帝上《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提出制敌方略并遣责桂良妥协畏敌言论。强调长江通商危害极大。长江"山川设险之所，城邑扼要之区，处处皆中原大局所关，断不宜令夷人实逼处此。"②

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䜣亲见清军被外国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同时，南方太平天国反清斗争如火如荼，慑于侵略者的军事压力；出于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恐惧与仇恨，使其思想由"制夷"转变到"款夷"上来。

奕䜣脱离传统的治国方略向洋务派转变的第一步，是他接受咸丰议和诏命。咸丰帝逃到热河后，命奕䜣以清王朝全权代表资格，赴北京与英法联军谈判，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南驶，中外和局促成，清王朝暂时脱离了险境，奕䜣开始重新筹划清王朝的出路。

1861 年，奕䜣联合桂良、文祥向咸丰帝密陈治国大计。

第一，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即所谓"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③的对外政策；对内则要坚决消灭"发捻交乘"的"心腹之害"。

奕䜣认为，英法"诸夷"与中国古代的"夷狄"不同。该夷不以亡我社稷，取代我朝政权为目的。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④。因此，对待英法侵略者，"专意用剿"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权衡轻重，必须"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⑤《北京条约》的签订，是形势使然。接着，奕䜣等又用"自换约以来，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⑤来说明侵略者是遵守条约，讲求"信义"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内忧外患危机的解除。为摆脱对外受制挨打，对内镇压人民反抗斗争，解决清朝的严重政治局面，奕䜣提出一项整顿大局的方案。他说："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惟有隐消其鸷疾之气，而未遽张以挞伐之威，倘天心悔祸，贼匪渐平，则以皇上圣明，臣等竭其颛蒙之力，必能有所补救。"⑥在这种情况下，奕䜣提出对外国侵略者要采取"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⑦；对内则要坚决消灭"发捻交乘"的"心腹之害。"

第二，采西学，制洋器，实现自强。

奕䜣等人并没有彻底投向外国侵略者的怀抱中。奕䜣只是认为清政府处于"饷竭兵疲"的不利情况下，如果一味外抗侵略，则有"旦夕之变"。向外"隐示羁縻"，是暂时的。奕䜣认为，如果忘记了还有外侮，"忘其害而全不设备，贻子孙之忧。"奕䜣想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暂时无战事的客观环境，首先着手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然后不断增加国力再抵抗外来侵略者。

为了向外"隐示羁縻"，在奏折中，奕䜣建议清朝中央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调整中外关系、解决中外争端的专门机构。接着又上奏朝廷，"倘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枪炮)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并由咸丰帝"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⑧

奕䜣认为："善治者，必先培养本根，本根固而蟊贼自消"⑨为了培养本根，他主张："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⑩

奕䜣的自强纲领的实施包括三个方面：(1)直接从外国购置枪炮。更换清军的武器装备，加强清王朝的统治力量。(2)奕䜣认为"查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⑪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过程中，奕䜣等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横行海内，完全是由于他们船坚炮利。清王朝要想自强，除了购置洋枪、洋炮、军舰外，还要自己能够制造。正是在奕䜣等人的推动下，清政府得以同意筹建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等军事企业，以实现其"船坚炮利"的目的。

第三，主张兴办学校，培养洋务人才。

随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打开，中外接触极为广泛和频繁。中国固有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奕䜣认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⑫1862年，奕䜣奏请设同文馆，其目的是为了了解各国的具体情况，为了不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欺骗，"先谙其言语文字。"1866年，奕䜣又上奏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臣等公同商酌，现拟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一体与考，由臣等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察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之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⑬自1861年洋务运动兴起，到1868年创办军事企业有七、八家之多。仅同文馆专修外语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对人才需求。奕䜣力主加强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学习。必须加强学习的科目，在奕䜣的主张下，同文馆扩大了。增加了许多科目如：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扩充后的同文馆由一个专门培养翻译的学校，改为初具规模的高等学校了。1866年12月，奕䜣又上奏说……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

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政欲讲究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论者不察，必有以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⑭做为一个清朝皇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奕䜣能有此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洋务运动起自兴办军事后业，随后又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这与奕䜣等人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自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到1895年甲午战争，中外之间除了爆发一次中法战争外，基本上相安无事。奕䜣企图利用这段时间通过发展中国的近代军事、民用企业，培养近代化所需要的人才，实现中国"自强"的目的。但是，奕䜣的自强活动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地主阶级内部的顽固派。每当洋务派有新举措，几乎都要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而顽固派在清王朝中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正是由于这些人的阻挠，使奕䜣的洋务活动步履艰难，一些主张不能得以实现。二是最高统治者慈禧的牵制。本来，奕䜣等洋务派的思想与方略的贯彻执行，在组织上的保证便是"辛酉政变"后建立的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政治体制新格局。1861年11月初，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发生的"辛酉政变"，初步实现了最高权力由顽固派向洋务新贵的转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确立奕䜣议政王并主管军机处、总理衙门的领导体制，进一步为全面推行洋务新政铺平了道路。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得以在内忧外患的政局中喘了一口气，奕䜣"功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猜忌，曾一度罢免了他的议政王和军机大臣之职。后虽又重新起用，但奕䜣的从政活动不能不小心翼翼。而在开展洋务活动这个前所未有之创举中，便要有所顾忌了。

纵观奕䜣的思想主张，不难看出，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积极维护者。在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中，他不惜投靠外国侵略者，主张"借师助剿。"并力主对外妥协。主持了《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反动清王朝的代表者。但是，奕䜣也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发展中国军事工业的主张具有反对外来侵略的要求，有使中国自强的愿望，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特别是在开展洋务运动的活动中，他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创办同文馆，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而且在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近代中国了解西方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奕䜣的积极倡导下，洋务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并伴随洋务运动的发展，近代中国出现了洋务思想并形成为晚清社会的重要思潮。它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中外关系的复杂矛盾和变革，经历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最初，这一思潮只是奕䜣等人为了挽救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在内忧外患中寻求复兴，避免清王朝沉沦的一种思潮，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不断尖锐，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开明官僚、商人卷入进来，使这一思潮不断发展，并孕育了早期维新思想。在这一思潮的产生、形成、发展过程中，奕䜣洋务观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⑪⑫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
⑧《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料选辑》上卷 第一分册 第206页。
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
⑩《洋务运动》丛刊(二)。
⑬⑭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6。